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总主编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上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

张培刚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



总主编：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上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

张培刚 著
曾启贤 万典武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张培刚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ISBN 7-5609-2828-5

I. 农…

II. 张…

III. ①工业化-关系-农业-研究

②农业现代化-研究

IV. F303.3

农业与工业化(上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

张培刚 著

责任编辑:向 锋

责任校对:章 红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5012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照排室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37 000

版次:2002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609-2828-5/F·235

定价:1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1913年生，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1—1945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张培刚

副总主编：夏振坤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齐云 汪小勤 宋德勇

张卫东 张建华 徐长生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djustments That Take Place a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Industrialized*

Pei kang Cha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 WUHAN UNIVERSITY • RESEARCH
FELLOW •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 ACADEMIA SIN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1 9 4 9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VOLUME LXXXV

AWARDED THE DAVID A. WELLS PRIZE FOR THE YEAR 1946—1947 AND PUBLISHED FROM THE INCOME OF THE DAVID A. WELLS FUND. THIS PRIZE IS OFFERED ANNUALLY, IN A COMPETITION OPEN TO SENIORS OF HARVARD COLLEGE AND GRADUATES OF ANY DEPART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OF NOT MORE THAN THREE YEARS STANDING, FOR THE BEST ESSAY IN CERTAIN SPECIFIED FIELDS OF ECONOMICS.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194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是第一部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曾获该校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在国际上颇有影响。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现将本书中译稿,作为《农业与工业化》的上卷出版。作者将在此基础上,对本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作者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向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寻求“产业革命”以来它们各自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并立足于农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加以考察。

“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总序

“发展经济学”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以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等,都可以算是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題。这里的“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其主要特点是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扶持和协调发展。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狭义的发展经济学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在一般意义上考察经济发展问题,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条件下,研究农业国家如何成为工业国家,经济落后国家如何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则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考察那些大多数的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已经存在少数先进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后进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有其有利的条件,亦有其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条件是,当后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时,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可资借鉴,有先进的技术和巨额的资金可供利用。不利的方面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是过去的宗主国,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则大都是过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即使到了今天,在相互的交往中,前者依然习惯于以主人或强者的身份自居,他们尽管承认后者在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则仍然要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原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地。纵然前者确实是想以平等

的身份对待后者,但由于诸般原因和经济上的优劣之势相差甚巨,因而在国际交往中,后者亦难免亏多益少。加上有些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人口负担过重,或者社会历史束缚过多,或者政治限制过紧,以致难以抓住有利时机,实现经济崛起。这些都是狭义发展经济学所要讨论的难点问题,也是当前发展经济学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由此观之,当前的发展经济学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前途大有可为。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国外一些学者却对发展经济学的前途持有不同程度的悲观看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繁荣了一段时间以后,到 70~80 年代,“已经在走下坡路”,由高潮转入低潮,进入所谓的“收益递减阶段”(参见 G. 拉尼斯:《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载《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4 页);甚至有人认为,发展经济学现在已经或快要“死亡”了。这些看法当然有其理论背景和现实原因。毋庸讳言,发展经济学在 80 年代以后确实不像 50~60 年代那么繁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整体来说,也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然而,正如上面所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难点问题,发展经济学不仅应该存在,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前途正不可限量。那么,摆脱目前这种困境的出路究竟何在?一些学者提出今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应该是从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主,转到以研究组织和政策的变化为主。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讲求实际的,并且使人颇受启发,具有某些革新意义,但仅仅这样,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也不能摆脱当前所处的困境。

基于这种考虑,1988 年 10 月在青岛会议上,我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难题,摆脱发展经济学当前所处的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这就要改变过去那种仅以第三世界中采行市场经济即采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而把第三世界中实行计划经济或采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做法。发展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前者，更要研究后者，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问题，研究它们在转型中的发展或发展中的转型问题，这样就较大地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的范围，丰富了其内容。

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小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更要以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社会情况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巴西等）为重点，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广泛全面而又综合深入的研究，探根溯源，寻找良策。这也就需要改变过去发展经济学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正确途径，也才能真正摆脱发展经济学目前所处的困境。

其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西欧、日本等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条件差异，借鉴西欧、日本当时促进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其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这就需要深入剖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制度原因和现实制约因素，准确把握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针对具体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

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倡议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全国

各地的一批青年经济学者,针对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实践,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考察,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专著(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于1999年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扩大版)。这部专著可以说是我们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实践。在这之后,我们又组织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青年教师,结合博士论文的写作,分别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若干重要问题,以专题形式,继续进行探讨和深入剖析。现在,陆续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在,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所进行的艰苦探索的成果,其中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技术创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转型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和制度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等都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我本人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的国际和国内方面继续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问题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中国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的巨变所引发的经济进步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考察。随着研究工作的向前推进,本单位今后还会陆续有一些成果问世。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建立新发展经济学,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将有所助益。当然,这些作品都是属于探索性质的,一定有不少欠缺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指正。

张培刚

1999年5月于华中理工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自序

本书写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酝酿,却早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以及毕业后参加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时,便已开始。当时我经常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将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进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先学习工商管理,后又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我除了具体了解到美国的一些现实情况外,更从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较多地阅读了有关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从“产业革命”以来各自实行工业化的书刊,从而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带世界性的问题。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两三年,我想到大战后的中国迟早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因此,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将要遇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将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在我当时所阅读的书刊中,还没有看到一种专著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英文原稿以《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为题,作为博士论文完稿于1945年冬,就是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初步尝试。

1947年春,哈佛大学决定将本论文列为《哈佛经济丛书》,于

1949年出版。1951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1947年到1948年间,当时跟随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的两位研究生,现任武大经济系教授的曾启贤同志和现任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的万典武同志,曾经根据论文原稿将全书译成中文,但我未予出版。

三十余年过去了。在这个期间,曾有欧、美、亚、拉美等地区的一些经济学家来信询问或专程来访,想同我讨论本书提出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却未能再继续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

自从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我国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提到了议事日程。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尽快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成为我国经济学界所要从事的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要研究我国或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无疑地主要是根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但同时也要了解外国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从中有所取舍和借鉴。我原来撰写的《农业与工业化》,就其所提出的问题、所搜集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以及所作的某些分析,容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参考,并可作为我自己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的起点。但原稿写成立于三十多年以前,自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世界的一些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一切特点和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本书原来的分析,重新加以考察和探讨。更者,我国现在所实行的工业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又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专题研究。为此,我特于去年秋冬间制定出新的写作计划,拟将全书扩大为上、中、下三卷,仍冠以《农业与工业化》的总标题,而将早已以英文本问世的本书作为上卷,加上分标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一次以中文与

我国读者见面。接着我计拟在数年内,写成中卷《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和下卷《社会主义中国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陆续出版。回想我撰写本书上卷时还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现在我已年届古稀,看来要完成本书后续部分的写作任务,还十分艰巨。但当此祖国四化建设宏图大展的历史时刻,我一定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尽力实现这一写作计划。

本书上卷中文版,仍以曾启贤、万典武两同志的中译稿为基础,特在此向译者致谢。从去冬到今秋,我自己又花费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是我重病后住在医院治疗和疗养的时期),前后三次,把中译稿从头到尾,逐段、逐句、逐字地进行了审阅和修订。在内容方面,为了历史存真,除了个别词句外,我未加以任何改动,全部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在译文方面,则在准确性、文风以及用语、用字习惯上,我做了比较多的修改和核正。当年在撰写本书时,往往假定“社会制度是给定的”,或者指出“对社会制度不予考虑”。在分析上,采用了经济学中常用的抽象法,因而本书的结论,对于一切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均有参考价值。但是,采用这种分析方法,也造成了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农业国工业化的比较研究难以深入的缺陷,从而反映了本书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张培刚

1983年10月,于武汉市
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

《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

张培刚 口述

谭 慧 整理

前些年,董辅初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1946年秋,当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后,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接着他又不无感慨地说:“张培刚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①

董辅初教授所说的那颗在天空中闪过一道亮光的流星,我想指的就是张培刚先生于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而现在又重印发行的这本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鉴于它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之作,该文由此而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此书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

^① 见薛永应著:《董辅初评传》p.20,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从而先生本人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①

《农业与工业化》写成的历史缘由和经过

这部著作之得以写成,来由甚早甚远。正如培刚先生所说,“诚然,读书使我获得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我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六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这篇博士论文的。”

一、青少年时期和大学求学时期,打下基础

培刚先生于1913年7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时候起就随家人从事过放牛、砍柴、栽秧、割谷等劳动,亲身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立下志愿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寻觅一条出路。20世纪初叶和中叶,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外侮日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益炽,“五七”、“五九”、“五卅”国耻接连不断。先生常常自问: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近百余年来,为何屡受欺凌,任人宰割?这种民不聊生、民族危亡的情景,日益促使他发奋读书,从不懈怠地探索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途径。

^①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艾玛·阿德曼教授(Irma Adelman)说:“《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这本书应看做是发展经济学的最早作品。”——见谭慧编:《学海扁舟》,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帕金斯教授(Dwight H. Perkins)说:“在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一书就算是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了。”见上引书,p.422。

1982年,世界银行专家霍利斯·钱纳里教授(Hollis Chenery)在上海讲学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培刚·张”。

可以说,这是先生日后形成的人生观和学术观点的最早根源。

1929年春,15岁半,他插班考进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下学期;一年半后,预科毕业。

1930年秋,17岁,他顺利进入武汉大学本科经济学系一年级,1934年6月毕业。

据先生在1993年所撰写的一篇怀念大学基础课老师的文章中所言,他在预科学习的,几乎全部是基础课;在本科学习的,则大部分是专业课,小部分是基础课。他还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地说:“我的大学老师都已作古,有的已离开人世四五十年。但不论是基础课老师还是专业课老师,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们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精神,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①

先生常说,“百丈高楼从基础起,做学问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先打好基础。”

先生在武汉大学读文预科和本科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是数学、国文、英文,还有论理学(亦称逻辑学或名学);此外,还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和一门理科课程。

数学从文预科到本科一年级,都是由副教授程纶老师讲授,他讲课朴实清楚。由于培刚先生对数学有天分和特大兴趣,在中学时通常做练习总是赶在老师讲课进度的前头,根底较好;所以这次他报考武大插班虽然跳越了一年半,但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加班加点,很快就补上了数学课的跳越部分。大概经过半年到一年,他就基本上赶上了进度。他还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主要是讲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后来解析几何提前列为高中课程。

关于英文课,据培刚先生回忆,他在读文预科一年级时,是张

^① 参阅张培刚:“怀念母校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载武汉大学百年校庆纪盛专册《百年树人,百年辉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转载于《张培刚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有关在武汉大学学习基础课事例,皆出自此文。